

李大钊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三大贡献述略

蒋成会

(中共中央党校 党建部, 北京 100091)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这件大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思想上,深入学习研究、多种渠道传播、自觉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培养优秀人才、适时酝酿建党、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实践上,助力五四运动、支持工人斗争、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实践基础,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立;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2-0058-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2.009

A Brief Account of Li Dazhao's Thre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 Cheng-hui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epoch-making event.” As a disseminator of Marxism, Li Dazhao played a great role in this process. Ideologically, he vigorously studied, spread and defended Marxism; organizationally, he actively trained talents, prepared and created communist groups; and practically, he helpe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upported workers’ struggles, and promot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hort, he laid the ide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ey Words: Li Dazhao; founding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practical foundation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不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宣传、教育和研究,而且实践中还重视团结、培养进步青年和组

织革命,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批共产主义者;他初步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他还积极地投入具体的建党工作,领导创立共产主义小组。他虽然没有参加党的成立

作者简介:蒋成会(1983—),男,重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研究。

大会,但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实践基础,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奠定建党的思想基础:深入学习研究,多种渠道传播,自觉捍卫马克思主义

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也就是说,一个政党要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就必须用先进的理论作为这个政党行动的指南,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政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先进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因此要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就必须先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思想基础。而中国探求救国真理的先进分子的思想本身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从外部灌输进去的,这就需要传播者给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需要先进分子们学习、接受、掌握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灌输者,在学习、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基础。

首先,李大钊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同众多寻求救国道路和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始终关注民族的危亡和国家的命运,非常赞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但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封建军阀混战、共和国有名无实,李大钊深深地感受到“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吾民也”^{[2]4},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能救中国。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更加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并开始否定资本主义道路,提出“欧人自己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565},也是此时开始逐步抛弃资本主义救国的思想。在中国大小二百多个政党争权夺势、植党营私的情况下,李大钊清楚地看到这些政党不可能为人民谋福利,只有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党才可以救中国。也正是在此时,李大钊开始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俄国革命的胜利更让他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很有意义,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强大的震撼,

是中国革命的榜样。李大钊就是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学习俄国革命成功的案例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为“拯救中国的导星”^[3]。

其次,在坚信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从不放过任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4]87},通过多种渠道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是撰写相关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开始,先后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不但指出了俄、法两国革命的不同,还向先进的知识青年和广大民众系统地介绍了俄国革命,称赞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5]226}。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20世纪的革命潮流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只能迎,不可拒”^{[5]225},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117}。认为中国要去适应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俄国革命对中国“格外有意义”,热切希望中国能够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通过对俄国革命的进一步认识,也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19年,他在《新青年》分两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更多的先进分子认识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二是通过创办刊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努力下,一些刊物也开始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新青年》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国民》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晨报》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每周评论》则是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三是在大学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除了撰文之外,李大钊还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到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多所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主要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马克思的历史”等课程。仅三年的时间,这类讲义和讲稿就多达130多篇。

再次,李大钊在实践中主动捍卫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大量的非

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纷然杂陈,这些思想干扰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其中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甚至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迷惑民众,这些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很不利的。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面红旗,李大钊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公开地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主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大肆宣扬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挑起实质为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和需不需要革命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给予反马克思主义者以迎头痛击,强调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批判了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需要。同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单单是一种主义,而是解决问题的工具。通过这场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随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挑起“社会主义论战”,他们口头上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但本质上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只能“冷静研究”,极力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而李大钊牢牢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新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反马克思主义言论给予回击,并强调“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到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6]277},这进一步肯定了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面对黄凌霜、区声白等攻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平均主义,甚至撰写《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等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李大钊则是撰写了《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自由与秩序》等文章,揭露了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

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的本质,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战胜他们,不但严肃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扩大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知晓度,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通过这些论战,一批爱国进步青年,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二、奠定建党的组织基础:培养优秀人才、适时酝酿建党、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7]。要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在确定指导思想之后,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就是信仰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及最初的党小组,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创立的组织基础。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为只有成立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3]444},于是着力培养了一批忠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还协调各方为创建政党做准备,又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

一是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更注重对青年人的培养。由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灌输,一大批以救国为己任的先进青年们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迅速成长和进步,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走上革命的道路。李大钊还特意去培养他们,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们受李大钊的影响,成为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骨干分子,逐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成为党创立后第一批党内骨干力量。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之后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和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为了培养更多的进步青年和进一步坚定进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李大钊在异常艰难的条件秘密领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这个研究会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并以此来教育和培养更多的人,其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事事亲为,亲自印刷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召集大家对书中内容进行研讨。此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国民社、新潮社也相继成立。李大钊不愧为指引进步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良好益友,在他的培养下,中国更多的有识之士成为他的追随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为党的正式创建培养了力量。

二是协调各方为创建政党做准备。要在中国这样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欺辱,又有封建军阀横行的土地上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协调工作。简而言之,就是要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大方面。国际上,帝国主义欺凌中国,根本不允许中国创建一个代表受苦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反抗他们在中国培植的封建军阀统治,而共产国际则希望中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内,封建军阀们不允许有反抗他们统治的政党存在,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难上加难。在国际国内双重困难的压力下,一方面,李大钊积极同共产国际代表商讨建党问题。1920年4月,李大钊同来中国考察的共产国际成员维经斯基多次会面,就中国革命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进行商谈。之后,在李大钊的安排下,维经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了解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他认为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因此同陈独秀等人一起筹划了一系列建党的准备工作,于1921年初回到北京,同李大钊交流了建党的各项准备情况,促进了建党条件的成熟。另一方面,李大钊积极同陈独秀等人商讨筹备建党。1920年2月,在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的时候,“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8]57}。在维经斯基前往上海后,李大钊又与陈独秀通信相商在北方和南方同时建党的筹备工作,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59}。之后,李大钊在未来成立的政党

的性质和名称的确定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党的最终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是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的前提和推手。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可行的、科学的,同时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中,李大钊领导创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相对扎实的一个,这种扎实主要表现在其成立的条件、时机、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上。1920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方和南方同时筹建政党之后,就进一步加速了建党的进程。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大钊同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开始在北京筹划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取名“共产党小组”,创办《劳动者》,“由李大钊任书记”^{[8]61}。李大钊每月捐出三分之二的月薪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在带动北方党团组织的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组织工人运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涌现了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创建创造了条件。

三、奠定建党的实践基础:助力五四运动、支持工人斗争、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指出,“批评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马克思主义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是彻底的理论,所以能够说服人,尤其是能够说服被压迫的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能够为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以,在李大钊的带动下,一大批立志救国的先进分子选择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实践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一是李大钊参与并助推了五四运动。自1840年起,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日益沉重,但广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完全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帝

国主义的本来面目被中国人民看清,有组织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尤其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广大中国人民迅速觉醒,一场爱国运动正在酝酿。李大钊也看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初步感受到要彻底击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以及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离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不能成功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1919年5月4日,一场爱国运动从北京大学师生的天安门集会中爆发,李大钊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导着运动的发展方向,《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山东问题》《新华门前的血泪》等战斗檄文直指问题的本质,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5]339}等许多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强盗的主张,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口号,号召民众丢掉对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这一过程中,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运动中得到了磨砺和锻炼。如“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邓中夏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去上海参加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在运动后期,陈独秀被北洋军阀逮捕,李大钊一边继续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一边积极营救陈独秀,成为这场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大量的短文,抨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使得运动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件,成为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践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而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加速了建党进程。

二是大力支持工人运动,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李大钊深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力量,才能进一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所以一开始他就注重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他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5]304}。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少但受压迫沉重,所以李大钊并不局限于对工人的一般宣传,而是特别

注重提高他们的觉悟,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向他们讲授同帝国主义、同封建军阀做斗争的原因,更向他们讲授工人为什么受苦。他还亲自指导工人运动。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革命者赴各地帮助工人建立组织,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创办夜校,出版通俗刊物,并指导工人开展运动,促进了工人阶级新的觉醒,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结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小组更是积极调研工人阶级的情况、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实践基础。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上,李大钊发挥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作用。无论是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在实践上,他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他的这些贡献,中国的革命才朝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前进,他的名字也因此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2.
-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12.
- [4] 朱成甲.李大钊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责任编辑:李亚平)